

解析土耳其骚乱频发的原因及其影响^[1]

丁 工

【内容提要】2010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土耳其一度表现得风生水起。土耳其政要支持民主运动的外交姿态及其民主体制，促使该国力图扮演中东民主化变革的旗手角色。但近期以来，土耳其多次发生针对“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政府的结社抗议活动，以至于让世人惊觉土耳其似乎也要遭遇“阿拉伯之春”。本文从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分析土耳其国内宗教和世俗两派势力博弈对土耳其政治局势走向的影响。

【关键词】正义与发展党 阿拉伯剧变 利比亚动乱 教俗之争
土耳其 埃尔多安

【作者简介】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特约研究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7) 01-0109-12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与国际反恐联盟的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6CGJ014）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美在亚太地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CGJ022）的阶段性成果。

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一小撮”军人发动军事政变，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经历了惊魂紧张的一夜。16日，土耳其总统宣布成功挫败政变阴谋，政府已经完全控制局势并将严惩、肃清暴动分子。回顾历史，加上这次“短命”的政变，自1960年以来，土耳其共发生了五次“兵谏”。2013年6月，因加济公园拆迁项目引发广场骚动后，土耳其再度出现群体性民众抗议活动。随后，土耳其又因全国性地方选举正发党获胜、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当选新任总统等，先后引发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这次政变的起因，是自2014年初以来，正发党政府多名部长级高官涉嫌贪腐丑闻被曝光，土耳其多地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运动，要求执政当局对腐败指控负责，并高呼“独裁者埃尔多安辞职”、“集权政府下台”的激进口号，随之引发警民之间的暴力流血冲突。

土耳其一再出现聚众结社和抗议浪潮，以至有评论认为，土耳其同样陷入转型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街头政治对抗议会政治的漩涡，部分国际媒体更是大力热炒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土耳其翻版。由于在整个中东剧变期间，土耳其都是以“伊斯兰世界民主的旗帜和标杆”自居，通过支持、响应民众的变革诉求而博得了地区多国的掌声和国际社会的喝彩。而现今，土耳其持续出现民众集会抗议事件，不仅将其政府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也使人们对土耳其一直以来极力打造的伊斯兰民主榜样的国家品牌产生了巨大疑问。土耳其为什么成为了一个政变和街头暴乱频发的国家，引发本次“未遂”政变和成为抗议“策源地”的导火索又是什么？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解读和评析。

一、土耳其不是“阿拉伯之春”的翻版

土耳其近期一再出现的大批民众游行示威、抗议现政府的现象，由于与2011年初始兴起、至今席卷中东地区，一度诱发多国政府垮台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变革运动有诸多类似特征，以至有西方媒体惊呼正在开启“土

耳其之春”的序幕。但实际上，尽管土耳其所遭遇的街头政治在表现形式上，同阿拉伯变局中引发强权政府倒台的街头抗议活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二者却有着原生性的差别，难以成为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土耳其版本。

事实上，当前土耳其已经搭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稳固的民主共和制度，形成了在多党制格局和议会制框架下，经由自由公正的竞选活动选举产生领导人的体制机制，实现了伊斯兰教和民主文化的兼容对接，故而常被喻为“中东—伊斯兰世界民主的表率、自由的典范”。虽然土耳其现行的民主政治架构还不够完美，但相比于剧变前“强人统治”下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土耳其早已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制，基本能够按照正常的民主选举程序推动政权交接的制度化运作。埃尔多安总理虽然作风有些独断专行，但作为民选领导人，其与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家族独裁者，存在着赋权方式和执政机理的异质性、本能性区别。

自2003年埃尔多安当政后，土耳其在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后，单独执政的正发党政府进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改革。面对危局，埃尔多安领衔的新政府果断做出稳定金融市场是当务之急的决策部署，在及时、稳妥、审慎地处理财政领域出现的各种危机风险，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之后，土耳其新政府随即健全、整肃金融监管机构，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将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着力点。随着新经济政策的落实到位，土耳其宏观经济形势触底反弹，并逐步走上高速发展的正轨。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优化，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科技企业集团。^[1]正发党政府不仅把土耳其带向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还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红利，加大资助平民阶层的力度，一定程度上消除、缓解了不同阶层的尖锐对立，促进了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在外交领域，积极实行“邻国零问题”政策，对地区事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国际地位和区域影响力显著抬升。

[1] Ahmet Davutoglu, Zero Problems in a New Era: Realpolitik is no answer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Arab Spring, *Foreign Policy*, March 21, 2013.

在多边外交方面，土耳其政府与覆盖不同领域、职能的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建立了成员国、观察员身份或对话伙伴关系等多种形式的联系。土耳其继成功主持索马里问题联合国大会、南北苏丹和谈后，又联合西班牙共同促成了世界文明联盟论坛的召开，以实际行动有力回击了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同时还积极运作并大力促成本国人埃克梅勒丁·伊赫桑奥卢（Ekmeleddin Ihsanoglu）当选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秘书长。同时，土耳其还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被吸纳进入二十国集团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范建设，成为直接置身国际制度改革和规则设计的“体制内”国家，更突显国际社会对土耳其重要作用的认同和倚重。

随着土耳其内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外部生存环境的改善，埃尔多安在国内的威望几乎无人可以企及，广泛受到各个利益阶层民众“英雄般的欢迎”和“明星般的追捧”。他超高的人气和优良的政绩不但确保正发党每选“必胜”，也成为埃尔多安从未在选战中失利的主要因素。但与此同时，竞选连任的成功也助长、催化了埃尔多安铁腕专断的作派，以及正发党本位主义意识的膨胀，导致部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增。埃尔多安的强硬统治手段早就使政府与军方之间关系紧张，从而为军变埋下了危机的隐患。同时，土耳其近期的内政外交出现较大决策和判断失误，不仅身陷叙利亚内战泥潭无法抽身，还受到难民潮拖累，推高了自身的财政压力，本土又不断遭到恐怖分子和库尔德分离势力的暴力袭击，这些因素也成为促发政变的触点“引信”之一。

虽然埃尔多安遵循选票主义的多数原则，运用民粹手法使自己成为一个长久执政的“民选独裁”者，但按常理说，他是纯粹的宪制民选总理，具有民主制度赋予的无可非议的合法性权力。因此，土耳其抗议者在塔克西姆广场喊出的“独裁”与埃及抗议者在解放广场喊出的“独裁”涵义完全不同，自然也就不存在开启“阿拉伯之春”土耳其版本的法理依据和因果逻辑。^[1]

[1] 郝昊：《土耳其占领盖齐运动中视频传播与线上参与度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事实上，土耳其连续出现的严重社会骚乱和群体暴乱，从表面来看，是部分国民军方人士对执政当局强行改造塔克西姆广场的野蛮行径，以及警察滥用警力、粗暴执法和政府高官涉嫌贪腐丑闻的不满情绪宣泄，而潜在原因则是不少人对埃尔多安为所欲为的家长式专权作风的抗争，但更深层的缘由却是世俗现代势力和宗教保守势力之间价值取向的碰撞和发展朝向的博弈。

二、土耳其政局动荡背后的原因考量

自现代土耳其建国时起，国父凯末尔就将土耳其定性为世俗、西方、民主的共和国，但土耳其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却始终困扰于教俗之争，徘徊于多党民主与军人干政之中。^[1]作为一个 97% 的国民人口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又自认为是高度世俗的国家，伊斯兰教同政治的关系历来是土耳其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话题，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道路之争一直非常激烈，曾多次引起政局动荡。

长期以来，虽然土耳其政府积极推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力图达到国家层面的全盘西化，但在社会层面，伊斯兰教思想留下的政治烙印却依旧根深蒂固。土耳其作为拥有悠久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国度，无论是表现在社会生活方式上，还是体现在政治诉求的表达上，伊斯兰教都占据了相当大的选民基数，并且拥有相当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组织动员力。宗教情结已成为深植于部分国民心中无法割裂的文化基因。尤其在内地乡村和偏远边区、以及城镇中下阶层居民中间，政治伊斯兰倾向拥有扎实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对于世俗化道路的认同则更多来自于市民精英和中产阶级。因此，这种穆斯林社会和世俗化政治二元属性的真实映射，便是自现代土耳其建国以来，教俗两派围绕最高权力的“党争”就成为土耳其政治形态中贯穿始终的脉络基线。国家政策设计的路线选择也一直被

[1] Morton Abramowitz and Henri J. Barkey, Turkey's Transformers, *Foreign Affairs*, No. 6, 2009.

教俗间的思想论证和发展朝向之争所困扰。在国家治理方面，世俗派认为，伊斯兰教法典已不适宜现代社会，只能在宗教领域发挥作用，国家要想实现善治、良政，必须依靠世俗律法。在社会生活中，世俗力量主张人们的服饰、装扮、男女在公开场合的亲昵行为等，均属于个人隐私和自由，政府无权也不应干涉。而宗教力量则强调，人们尤其是女性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古兰经》的宗法教义要求，对于违反“圣训”戒律的现象必须加以干预，只有如此才能净化社会风气、纯化意识形态。^[1]

长久以来，由国父凯末尔一手缔造的土耳其国防军自诩为土耳其世俗化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政教分离政体的忠实捍卫者。每当军队感到国家秩序陷于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世俗主义和民主制度受到宗教力量威胁和挑战，现政府已经不能正常履行捍卫国家宪法的职责时，土耳其军队都会出面接手政权，扮演镇压暴动、平息事态的角色。^[2]因此，“枪指挥党”和“党抵制枪”的军政斗争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一种“常态”。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多党民主制以来，土耳其军政双方的斗争一直紧张尖锐。长期以来，军队机构一直在政治体制中实践着“文人治国、军人监政”的治理模式。土耳其历史上曾发生军方三次（1960年、1971年、1980年）以强制接管的硬方式逼迫文官政权下台；一次（1997年）以取缔遣散的软方式胁迫民选政党退位的“恶性”事件。几乎形成每十年就上演一次军事政变的周期性“死循环”。

2002年，正发党虽然是以奉行“社会自由主义”的面目竞选上台，并在执政伊始极力打造温和西化的形象。但作为具有浓郁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组织，其内心深处却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化意识形态，并且随着正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主导议会局面的出现，该党固有的宗教保守色彩日益浮现迸发。近些年，埃尔多安政府曾因颁布一系列政策，包括控酒令、限制

[1] 郭宪纲：《阿拉伯世界教俗之争新态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83—92页。

[2] 章波：《土耳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6期，第70—82页。

酒类销售并禁止夜间饮酒、国有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空姐不准涂抹艳色口红、降低宗教学校儿童的法定准入年龄，以及试图推翻公立大学不许女性穿戴穆斯林头巾的禁令等，因此被反对者批评为违背土耳其政教分离的现代世俗政治原则。这每桩曾引发不同程度抗议和争论的“小事”慢慢堆积，便汇聚成为集中喷发的巨大愤怒，而起源于环保主义者抵制拆除公园的“偶发”风波，以及围绕高官政要腐败案件的司法调查，就是传统保守主义和现代世俗主义对冲撞击的鲜明体现。^[1]同时，正发党蝉联执政三届，形成“一党独大”格局，又变相加速了正发党的意志理念上升到政府行为、社会共识甚至是国家法令的层面，进而加剧了政治体系的保守化趋向扩散和社会生活中的伊斯兰化气息弥漫，再加上反对党长期在野，致使其政策诉求无处宣讲、立场意见无法发泄，进一步催生和激化了宗教保守与世俗自由两大政治派别的矛盾分歧和观点对立。

此外，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后，阿拉伯世界结束了“阿拉伯之春”以来宗教与世俗力量和平共处的状态，再度转入到教俗力量激烈斗争的“白热化”阶段。受埃及世俗力量“由守转攻”的激励和鼓舞，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世俗力量也开始仿照埃及实施大举反击，积极鼓动本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逼迫伊斯兰势力主导的政府下台、解散。利比亚甚至出现世俗背景的民兵组织攻打宗教势力主导的国民议会，两派民兵武装厮杀混战，致使国家一度逼近“二次内战”的困局。由于埃及公正与自由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等伊斯兰温和政党，同土耳其正发党在治国信念和理政思路中具有极高的趋同性和近似性，因此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力量受挫、世俗力量暂居上风的外部环境下，伴随着阿拉伯世界教俗力量对峙、争斗制造的危机外溢扩散，就成为刺激土耳其国内教俗两大派系集团角力升级的直接推手。由此可见，眼下土耳其频繁出现的街头示威活动根本就不是所谓“民主”

[1] 孔刚：《土耳其因应叙利亚危机的基本政策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1期，第71—82页。

与“威权”的对决，而是部分势力借题发挥所抛出的政治蛊惑和舆论渲染，宗教和世俗两派对权力索求的激烈交锋，才是隐匿在乱象背后的主旨根源。

三、土耳其街头骚乱频发的趋势影响

土耳其频繁爆发的示威抗议，特别是2016年7月的未遂“兵变”，不仅将正发党推向风口浪尖，一度还成为埃尔多安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尽管土耳其后来的政局发展态势表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均已“平安着陆”，但这一系列街头抗议活动仍对土耳其政治走向和政策动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导致其民主政治的先锋模范光环消退、社会阶层分野被继续撕裂，还对其周边邻国的政治生态和所处区域环境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侵蚀和冲撞。

（一）影响土耳其民主国家形象的推销展示

从中东地区政治运行机制内生性和外源性来看，中东各国基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均衡，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1]有的实行部落酋长统治、封建世袭专制，还有家族式独裁统治以及民主共和制。但总体来讲，中东国家的政体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君主制及共和制。在共和制国家中，可细分成“宪政共和”（从最高权力归属又包括“总统制民主”和“议会民主制”）与“威权共和”两种；君主制国家也可分为“绝对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两种。其中，伊朗属于糅合教权主义与选举精神、政教合一的“神权制民主”，以色列则是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全盘西化，土耳其基本是根据三权分立原则来严格贯彻民主选举政治，摩洛哥、约旦是部分执行竞争式选举的君主立宪模式，沙特则是具有“一党领导、多党合作”色彩的协商政治。中东变局后，受“阿拉伯之春”冲击波的影响，民主化作为大势所趋的潮流更加细密有力地渗

[1] 冯基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中东政治动荡中的海湾君主国》，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5期，第50—53页。

透到中东地区的各个角落，阿拉伯世界推行政治变革势所必然地被多国列入了议事日程的清单。这些经历过强人政治、军政权斗，如今又面临民主探索、政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非常希望能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2013年7月，埃及军方对在解放广场静坐的“穆兄会”的支持者进行暴力清场，不仅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和严厉批评，还将埃及徒有虚表的民主外衣撕裂，更是击碎了阿拉伯世界渴望重构民主政治的美好愿景。埃及的强人政治虽然走向末路，但选举政治却也陷入绝境，埃及的街头暴动引发了邻国民众的跟风效仿。随之，多国的政局动荡再次给地区民主化前景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摩洛哥以公正与发展党为首的执政联盟，也因多名阁部成员辞职引发政坛地震而面临解体的严峻考验；利比亚由“穆兄会”组建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公正与建设党领导的内阁，也日渐逼近危险的临界点。埃及的经历堪称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化“实验”的动态缩影，其结束军管后的首个民选制宪政府在军方强压下“破产”，似乎在宣告阿拉伯国家陷入到一种世俗化导致威权统治、民主化引发宗教复辟交替出现的无解轮回之中。

相对而言，土耳其军人监控、主导国务活动的能量、痕迹已经显著消退，军队作为成建制的独立政治实体，已被全面纳入到理性的政党选举和民主轮替行为框架内。因此，土耳其富含伊斯兰特色的多元民主模式产生的巨大外溢能效，吸引了不少茫然于黑暗中摸索民主道路的中东国家。各国纷纷开始“以土为师”，自觉与之看齐。而土耳其政府也乘机推介和兜售民主政治成熟运行的发展经验，一度将自身标榜为阿拉伯民主运动效法的典范和楷模。^[1]

相较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以本国规则为模板，简单加以修改后便而对中东穆斯林世界进行推销、传授的“伪善”民主，土耳其融合伊斯兰教义精神与民主共和意涵的施政理念、治国思路，更贴近、切合阿拉伯国家的

[1] 田文林：《土耳其战略转型及其局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9期。

实际国情和本土环境。^[1]因此，土耳其的民主模式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透射力。土耳其在严守政教分离、践行党政分开、破除军政分立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为阿拉伯国家、甚至穆斯林世界提供一个构建现代国家的成功范本。与之相比，无论是现有君权吸纳温和伊斯兰力量、隐约显现议会君主制的“摩洛哥模式”，还是各派别协商达成共识、宗教与世俗党阀共同分享权力的“突尼斯道路”，都不具有复制推广的普遍性和示范性。事实上，在海湾国家抵制最强烈而不轻易谈及民主的背景下，伊朗等什叶派国家又被排除出考虑对象之际，土耳其的民主模式已经是伊斯兰传统基因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的榜样，是世俗思想与教义精神和谐共生的表率。这样土耳其便因其独一无二的民主身份，开始借着自由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旗号宣示自己在中东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但近期，土耳其多次上演大规模社会骚乱和群体性示威抗议事件，以及由未遂“兵变”引发的骚动危机，却使其民主模式的示范参考价值大幅缩水，前期累积的良好国家形象和品牌效应也严重贬值。国内外媒体对土耳其的溢美之词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政府居高临下姿态的指责和批判，土耳其的政治制度作为阿拉伯国家“取经”对象和学习榜样的光环开始逐渐褪色、消散。

（二）激化朝野政党矛盾和放大社会阶层裂痕

此次街头骚乱期间，大多数市民没有参加示威游行，且不赞成“政变”的激进做法；而民调也显示，近一半的土耳其人对国家现状感到满意，暴动危机才得以很快被平息化解。随后，正发党议员齐切克再次以绝对优势当选大国民议会议长，以及正发党在2015年11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与地方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等事实，都清晰明确地显示，正发党并未被近期持续频发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打乱阵脚。特别是2014年8月，在土耳其首次举行的总统职位的全民普选中，埃尔多安就以53.4%的绝对多数得票率首轮胜

[1] 鲜姆斯娅·希尔扎提：《土耳其在西亚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困境》，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出，当选该国历史上第 12 任总统。埃尔多安在担任了 11 年的总理后开始转任总统，并有意修改宪法，给原本属于虚衔的总统职位赋予更多实际权力，同时还举荐其亲密盟友、现任外长达武特奥卢继任总理一职。这都清楚地表明，土耳其政局并未发生重大的格局洗牌，正发党掌控政坛、大权在握的主导地位丝毫未被动摇，埃尔多安仍然是引领土耳其前进航向的掌舵人。^[1]但同时，街头抗议风波已然对土耳其的发展思路、政府形象、社会意识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冲击，社会形态中的断层线被彻底切割并形成秉性鲜明的公众裂痕，朝野党派的分野对阵也随之进一步撕裂，而对现政权一意孤行的不满还可能使政府观点与民间思潮的复杂矛盾成为新的不稳定隐患。尽管土耳其国内谴责政变者的舆论占据优势，但更多民众则表示，认同示威者的诉求，只是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沉默的大多数才应该是土耳其乱象的真实观感。这无疑成为埃尔多安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事实上，一些观察家担心，埃尔多安一直试图改变土耳其的政治体制，把内阁制变为总统制。未遂政变以后，他会以此为噱头积极进行舆论渲染和宣传造势，进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推进变革的政治氛围。接下来，埃尔多安还将对军方进行清理整饬，以名正言顺地打击、铲除“敌对”势力和异己力量，从而强化自己对政局和军队的掌控。随着埃尔多安完成职务转换，未来如果其将土耳其政体由议会制转变成总统制，让自己成为掌握实权的国家元首，极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国内教俗之间的“观念交锋”和“利益碰撞”更加激烈、尖锐。此外，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同正发党执政理念近似的北非伊斯兰政党相继遭遇挫折，也会从周邻层面消弭土耳其正发党倡导政治化伊斯兰运动的外部呼应和地域烘托。因此，倘若土耳其执政党依旧无视负面势能持续发酵的不利影响，继续推行过于宗教化的既定政策，不排除类似街头骚乱再度爆发的可能，进而成为点燃政局动荡、社会分裂的导火线，给国家正常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因

[1] 王林聪：《土耳其大选与埃尔多安的新时代》，载《当代世界》2014 年第 10 期，第 53—56 页。

素由相互促进变成彼此抵消、限制的局面。

（三）给土耳其入盟前景笼罩上一层厚重的阴影

2015年12月17日，欧盟与土耳其正式开始了时隔两年后的首场入盟谈判，这标志着近年因入盟谈判陷入僵局而一度趋于紧张的土欧关系出现重大改观。特别是在土耳其因2015年11月24日击落俄罗斯军机事件和“越界增兵”伊拉克引发严重外交风波而身处风口浪尖的敏感时点，欧盟仍然选择在此时重启已经搁置两年多的入盟谈判，以致有西方媒体评论，称欧土已步入“同频共舞”的节奏。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里，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外交往来极其频繁，部分欧洲国家关于土耳其能承受欧盟内部竞争的压力、不会成为欧盟经济补贴负担的言论，也掀起国际舆论对土耳其最终能否“梦想成真”、完成入盟的关注热潮。然而近年来，土耳其因传统保守和自由开放的价值观念交锋、世俗与宗教势力的党派利益碰撞引发的时局动荡，严重折损了土前期的政治改革成效，给其入盟进程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特别是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兵变后，欧盟对政变是由土耳其宗教异见领袖、目前旅居美国的法图兰·葛兰及其追随者发起的说法持彻底否定态度，对土耳其以“防止军人干政揽权引发骚动、激起民变”为名、行打击报复政敌之实的行动给予严厉批评。欧盟甚至据此认为，土耳其在法治、人权、民主领域尚未达标，大众民主时代的土耳其仍然隐藏着冲突和暴力的因子；土耳其对军方警界、内务司法系统等行政机构和职能部门的民主化改革进展过于缓慢，局部议题甚至出现“民主倒退、权力滥用”的情况。而在此种形势下，对土耳其政府民主体制运作模式和操作程序的质疑，又必然会极大地增加其为加入欧盟而推行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延缓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战略的正常进度。

【收稿日期：2016-11-10】

[1] Mehmet Ögütçü,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ow to achieve a forward-looking and "win-win" accession by 2015, Collegium, No. 31, Spring 2005, pp.37-55.

security strategy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OK-US-Japan trilater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the balance of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92 The Dilemma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llegal Immigrants and the Way Out, by Chen Jimi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Internationally, the issue of illegal immigrants is both a real one and a highly controversial one.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illegal immigrants involves such dilemmas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egal principles and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 claims among different behavioral entities. Correct cogni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illegal immigrant issue, scientific judgment of the causes and nature of the illegal immigrants, perfection of the multi-level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the illegal immigrants,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wil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global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the necessary ways to solve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illegal immigrants.

109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its Impacts of the Frequent Riots in Turkey, by Ding Gong, Guest Research Fellow from National Think-Tank for Global Strategy, CASS and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ASS. Since the drastic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in 2010, Turkey remained relatively calm and stable for some time. The diplomatic gesture taken by important Turkish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support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it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made Turkey try to play the role as a flagman to promote democratic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But recently, several protests against the AKP government occurred in Turkey, which has taken the world by surprise that it appears that Turkey is to experience the “Arab Spring”.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impacts the game-playing between religious and secular forces within Turkey has brought about on Turkish political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rastic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